

士气文心

——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

## 序

王水照

以文会友，自古而然，是个好传统。我和张惠民君的结识，也始于读他的《宋代词学审美理想》、《宋代词学资料汇编》等著作；及至今年秋天在银川举行宋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之际，才得以晤面倾谈。他以其与同学张进合著的近作《士气文心—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》问序于我，我本不敢应命，但我对苏轼似有一份特殊的感情，以致于了解别人心目中是个怎样的坡公形象，成了我的偏嗜，于是，才贸然应承了，也算是一种缘分。

我是相信一点“缘分”的。对中国古代作家的学习与研究中，我自问用力最多、相倾最深的是苏轼。说起来也充满偶然的因素，可谓是“东坡缘”吧。如果在大学时代没有参加《中国文学史》的《苏轼》一章的写作，就不会几乎通读他的全部作品，初窥“苏海”之浩瀚，被他的非凡创造才情所牢牢吸引；如果不是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，又一次参加该所正在编写的另一部《中国文学史》工作，《苏轼》一章恰缺人手，就由我承乏，并得到所长何其芳先生的直接指导，听他谈自己读苏的内心感受，我就不会初下决心走上治苏之路；如果不是居处逼仄，只能利用上海图书馆看书作文，自己的图书资料却禁止携带入馆，我可能不会承担上海古籍出版社《苏轼选集》的约稿，从而使我对苏轼文本的体会趋于深细；如果没有1980年成立的全国苏轼

学会,我就会失去许多治苏的学术同道,失去切磋商榷的良机。但这些“如果”都没有发生,于是我有了一个充实的“东坡缘”。甚至有些缘分是“隐性”的。回顾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,受到两位先生的影响最深,即何其芳先生和钱钟书先生。真是凑巧,何先生谢世时享年 66 岁,与苏轼相同,不过一为足岁,一为虚岁;钱先生逝世于 1998 年 12 月 9 日,这一天恰是苏轼的生日,只是一为阳历,一为阴历。在我的生活中,如影随形,处处感觉到苏轼的存在。

我今年招收博士生时,出过一道入学试题:“或谓周邦彦为‘词中老杜’,请予以评述”。这个题目实际上是“冲”着苏轼来的。众所周知,这个“或谓”是指王国维(虽然朱祖谋也有“清真之似子美”的品评,郑文焯有过“毕竟当以清真为集大成者”的相类意见)。王国维在《清真先生遗事》中说过“词中老杜则非先生(周邦彦)不可”的话。我预设的“标准答案”应论及两方面内容:一是王氏对清真词的评价,在不同文章中存在不一致的问题,即他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贬之为“创意之才少”,“能入不能出”,甚至比之欧阳修、秦观之“艳语”,竟有“淑女与倡伎之别”,但为什么在“清真先生遗事”中又说欧、秦乃至苏、黄,均“殊不逮先生”,并誉之为“词中老杜”?二是“词中老杜”具体含义为何,这就涉及如何理解他对苏轼的评价了。王氏另有《文学小言》一文,明确倡言“三代以下之诗人,无过于屈子、渊明、子美、子瞻者”,就是说,苏轼才是与杜甫等并列的“旷世而不一遇”的文学大家。值得注意的是,《人间词话》约写于 1906 年至 1908 年间(自署审定脱航于 1910 年),《清真先生遗事》1910 年写成,《文学小言》作于 1906 年,三文大体作于同一时期,人们通常从王氏前后期观点变化的角度来解释,恐不妥。

上述问题在学术界争论颇久，人言言殊，大抵角度不同，标准有异，难求一律。（刘熙载还认为苏词“颇似老杜诗”）我出题的目的仅在于测试应试者处理学术争端问题的能力，而自己所看重的却是王国维评苏轼四人的具体标准。他在《文学小言》中说：“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，其人格亦自足千古。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，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，殊未之有也。”又说：“天才者，或数十年而一出，或数百年而一出，而又须济之以学问，助之以德性，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。此屈子、渊明、子美、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。”他还说：“屈子感自己之感，言自己之言者也”，“宋以后之能感自己之感，言自己之言者，其惟东坡乎？”他突出的是“高尚伟大之人格”，是“学问”，是“德性”，是能“感自己之感，言自己之言”，这才是苏轼与屈、陶、杜并居“文学上之雄者”的共同条件。人格、学问、德性、独抒情性，我以为王氏给出了一个解读苏轼的要领。

张惠民君的这部苏学新著，正是围绕这个要领而展开他的全部论证，充分发挥他视野开阔而又长于理论思辨的学养优势。他不仅援引王氏《文学小言》的论断，作为立论的依据，尤见功力的是结合苏轼这一具体个案，对其人格魅力、精神境界的深刻丰富的内涵，作了相当透彻的论析，印证了王氏的论断，并在当下时代精神、学术理念的观照下，更有了新的突破与发展。

作者在开宗明义第一章即指出，“苏轼一生以一种开放兼容的态度，吸纳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，建构了自己博大丰富的学术思想体系”，这一“思想体系”表现为“卓然独立充满积极意义的文化人格”，表现为后人很少企及的“以天地胸怀来处理人间事务”的“天地境界”（冯友兰语）。这是苏轼精神世界的核心，也是作者研究苏轼的高起点。全书即洋溢着以一以贯之的思辨色彩，

对苏轼精神的方方面面作了全面考察,既具完整性,又有层次感。如对苏轼学佛的过程,颇为细致地梳理出始受于凤翔(受同僚王彭的影响),渐深于结杭而至黄州进入堂奥的过程。不少论析又切中肯綮,如提出苏轼学佛的最大特点,是他并不执意追求“信”与“不信”的问题,而是既不盲目迷信,也不沉溺其中,他只是取佛理以用于人生思考,以求得对人生真谛的大彻大悟。苏轼自己说得好,“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”,“无所得故而得”,断绝一切功利之念,才能获得对佛理、对人生的彻悟。这些分析都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为周密平妥。

作者善于把分散的、甚至片断的思想资料,依其内在理路审慎地进行梳理、鉴别,努力揭示出其实际存在的“潜体系”。作为文艺全才的苏轼,研究他的文艺创造思想自是题中应有之义,正如本书书名所标明的那样。作者分别从本体论、创作论、作家论三维视角切入,提出苏轼在我国文艺思想史上的最大贡献,在于他论证了文艺创造的最高境界就是主体情性的充分自由的表达,亦即“艺道同一”(本体论);文艺创造的最佳境界就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的自由境界(作家论);还论证了“艺道两进”的作家修养问题(作家论)。这一切又都建基于他人生境界的哲学本体论思想之上的,或者说,是在文艺创作领域中的自然延伸与展开。作者探索与建构苏轼文艺思想的“潜体系”的努力,也是值得称道的。

此书论述条贯,行文雅洁,读来惬意称意,时为不少闪光点所吸引。我为苏轼研究的新进展、新成果而欣喜,也期待作者续有佳作问世。

2003年11月19日于复旦大学

## 第一章 三教圆融与“天地境界”

苏轼一生以一种开放兼容的态度，吸纳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，建构了自己博大丰富的学术思想体系。苏辙在论及苏轼之学时云：“初好贾谊、陆贽书，论古今治乱，不为空言，既而读《庄子》，喟然叹息曰：‘吾昔有见于中，口未能言，今见《庄子》，得吾心矣。’……后读释氏书，深悟实相，参之孔、老，博辩无碍，浩然不见其涯也。”（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，《栞城集》卷二十二）此论苏轼之知识结构、学术思想源流变易极中肯而全面。其青年时期主要为从事治平功业做准备，奋励有当世志，故好贾、陆之书，究治乱之由，重实用之学，不为无用之空言。但其天性与庄子为近，少年起即儒道互补，以儒学为治世之术，而庄子则先得其心。贬谪黄州为一生转折，学业上深受佛家影响，由庄入佛，深悟实相，参之孔、老，三教交相为用，则于三界博辩无碍得大自在。最为可贵处在于，苏轼取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，并化道家避世佛家超世的明显的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，用以建构自己卓然独立充满积极意义的文化人格，从而达到一个后人很少企及的“天地境界”。

### 第一节 接受儒道佛思想的经历

苏轼对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学习接受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。

苏轼自幼学儒，儒家思想是他一生立身处世的根本。而对佛道思想，他却经历了前后期不同的变化。这个分期，当以贬谪黄州为界。在前期，他视佛道为消极思想，一方面受其濡染，自然而然地接受它；一方面又以儒学为宗，力排佛老思想的消极作用。在后期，他于忧患之中以佛老思想作为精神解脱之武器，取其超然旷达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，与儒家忧国济民之心、刚正浩然之气相融合，成为一种穷而不怨、刚而无馁的独立人格支撑。

### 一、前期

苏轼自七、八岁知读书，首先学习的是儒家经典著作。《宋史·苏轼传》载，公“生十年，父洵游学四方，母程氏亲授以书，闻古今成败，辄能语其要。……比冠，博通经史，属文日数千言，好贾谊、陆贽书。”苏洵《上张侍郎第一书》亦云：“洵有二子轼、辙，韶龀授经，不知他习。……始学声律，既成，以为不足尽力其间。读孟、韩文，以为可作，引笔书纸，日数千言，盎然溢出，若有所相。”（《嘉岭集》卷十一）苏轼晚年闻儿子苏过读书，忆及自己当年读书的情景：“却念四十年，玉颜如汝今。闭户未尝出，出为邻里钦。家世事酌古，百史手自斟。当年二老人，喜我作此音。”（《和陶郭主簿二首》其一，《诗集》卷四十三）可知苏轼于青少年时期即熟习经史，打下了厚实的儒学根基。而对贾、陆、孟、韩之文的酷好，为他树立仁人爱物、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奠定了牢固的基础，成为他一生思想的核心。苏轼二十二岁应进士考试，考卷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（《文集》卷二），依经立义，以仁义爱民之心，论刑赏皆应不失忠厚，突出地表现了儒家忠恕仁义的治世思想，被主考官欧阳修擢为第二。考官梅尧臣则“爱其文，以为有孟轲之风”（《上梅直讲书》，《文集》卷四十八）。

苏轼早期虽学儒奉儒，但也接受了佛道思想的濡染。苏轼

的祖母、父母皆信奉佛教，苏轼曾在《四菩萨阁记》等文中作过记述。他说父母“皆性仁行廉，崇信三宝”，临终之前“追述遗意，舍所爱作佛事，虽力有所止，而志则无尽”（《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》，《文集》卷十九）。苏轼七岁时曾从眉山道士张易简居天庆观北极院学习三年（见《众妙堂记》，《文集》卷十一）。以道士为师，居寺院之中，道家的思想不能不有所浸染。而苏轼的祖父苏序颇有些道家气质。他“疏达不羁”、“谦而好施”，对季子苏洵“少时独不学，已壮，犹不知书”的情形，亦未尝责怪强求，一切顺其自然（《苏廷评行状》，《文集》卷十六）。如果说长辈与蒙师的这些思想品德对苏轼会产生一些影响的话，那么，祖父疏达不羁、因任自然的个性气度似乎给苏轼以更多的遗传。故既而读《庄子》，不禁有“得吾心矣”之叹。

年少气盛、才高学富，刚经科举而入仕途的苏轼，正是雄气勃勃、奋厉当世之时，但由于读庄，在他的心底不知不觉涂上了一层淡淡的隐忧。苏轼二十四岁服母丧毕还朝途中所作的那些诗中（收入《南行集》），随处可见庄子思想的流露：“人生本无事，苦为世味诱。……今予独何者，汲汲强奔走。”（《夜泊牛口》，《诗集》卷一）“日月何促促，尘世苦局束。”（《仙都山鹿》，同上）“真人厌世不回顾，世间生死如朝暮。学仙度世岂无人，餐霞绝粒长苦辛。安得独从逍遥君，冷然乘风驾浮云，超世无有我独存。”（《留题仙都观》，同上）由这些咏叹不难见出，庄子厌倦尘世拘束，追求适性逍遥的思想与苏轼疏达不羁的性格有着一种天然的契合。苏轼二十七岁在凤翔府签判任期间，因公务出府下往宝鸡、虢、周至四县，始有机会游览了楼观、大秦寺、延生观等陕西有名的楼观寺院。他还一度去终南山太平宫读道藏。这为他深入了解道家思想提供了有利条件。苏轼在《读道藏》诗中写到：“嗟

余亦何幸，偶此琳宫居。宫中复何有，戢戢千函书。……乘闲窃掀搅，涉猎岂暇徐。至人悟一言，道集由中虚。……人皆忽其身，治之用土苴。何暇及天下，幽忧吾未除。”（《诗集》卷四）诗中“至人”以下几句，皆语出《庄子》。苏轼为自己乘闲阅读道藏感到庆幸，深悟心境空明、淡泊名利是治身的良方；幽忧之病未除，何以托天下之任。此期间，苏轼将终南山南溪的会景亭“制名曰招隐”，又将南竹林新构之茅堂“名之曰避世堂”（见此时期的诗题）。苏轼此时少年初出意气方盛，流露这种避世退隐的思想不无一些原因。他在凤翔府与知府陈希亮（字公弼）不甚协和，张舜民《画墁集》卷六载：“子瞻在歧，与陈公不相协，竟至上闻。”大约是由于仕途的不得志不如意，苏轼便借读庄悟道，排遣心中的郁闷。此时期，苏轼又受同僚王彭（字大年）的启发影响，始知佛法大略。其《王大年哀词》云：“嘉岭末，予从事歧下，而太原王君讳彭，字大年，监府诸军。……予始未知佛法，君为言大略。予尤喜佛书，盖自君发之。”（《文集》卷六十三）可知苏轼在此之前，还“未知佛法”；而“尤喜佛书”，自是后事。此时，苏轼初入仕途，人生尚无多大挫折，对佛学之好只是初有兴趣始知大略而已，而好庄悟道也多出于天性与藉以释解内心的不平。

事实上，此时期儒家思想在他头脑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。在为学、事君、治国的根本问题上，他毫不含糊地以儒学为宗，以积极用世的态度，抵排佛老思想这种无益治世、而“言以欺世”的虚妄之学。如他应制科时所上进卷之《韩非论》云：

后世之学者，知申韩之罪，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。何者？仁义之道，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；而礼法刑政之原，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。相爱则有所不忍；相忌则有所不敢；不敢与不忍之心合，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。今老

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，泛泛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适相值也。夫是以父不足爱，而君不足忌。不忌其君，不爱其父，则仁不足以怀，义不足以劝，礼乐不足以化。此四者皆不足用，而欲置天下于无有，岂诚足以治天下哉？（《文集》卷四）

苏轼认为，庄老之学论君臣父子关系不讲“爱”、“忌”，是不讲仁义礼乐，因此不足以治天下。他于熙宁二年丁父忧还朝后（三十四岁）上《议学校贡举状》言：

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，鬻书于市者，非庄老之书不售也。……使天下之士，能如庄周齐生死，一毁誉，轻富贵，安贫贱，则人主之名器爵禄，所以砺世磨钝者，废矣。（《文集》卷二十五）

苏轼以为，士人一旦以佛老庄周之学作为处世之道，则尊主忧国济民之心随之淡漠。取士“必欲登俊良，黜庸回，总揽众才，经略世务”，因此必“取之以实学”，“博通经术者，虽朴不废，稍涉浮诞者，虽工必黜，则风俗稍厚，学术近正，庶几得忠实之士，不至蹈衰季之风，则天下幸甚”（同上）。

此后，由于上书反对王安石新法而遭排挤，苏轼自请外任，出任杭州通判，转知密、徐、湖三州。此间，尤其是在杭州期间，他访游古刹寺院，结交僧道高人，诗词往来唱和频繁，思想情感上与佛道有了进一步的靠近。如《赠孙莘老七绝》之七云：“去年腊日访孤山，曾借僧窗半日闲。不为思归对妻子，道人有约径须还。”（《诗集》卷八）苏轼对僧道的这种亲和与靠近，仍是聊以消除内心的不平。正如《听僧昭素琴》所云：“散我不平气，洗我不和心。”（《诗集》卷十二）他的《和致仕张郎中春昼》中“盛衰阅过君应笑，宠辱年来我亦平”之句（《诗集》卷八），表达的正是一种

盛衰阅过，宠辱尝尽，心自放而万事轻，雄心意气消磨已平，而惟以歌诗抒写风情的无奈。作于湖州的《送刘寺丞赴余姚》诗云：“我老人间万事休，君亦洗心从佛祖。手香新写《法界观》，眼净不觑登伽女。”（《诗集》卷十八）表明他已开始读写佛书，并已初露万事皆休洗心从佛的心迹。

## 二、后期

苏轼真正读佛书识佛理，将儒释道三家思想兼容一体是在黄州以后。由舒 、李定等人构陷苏轼“讪谤朝廷”而震惊朝野的“乌台诗案”，使苏轼险遭灭顶之灾，也使他的处境和思想发生重大转折。苏轼在狱中一百三十日，出狱贬黄当日即作诗二首，其二云：“平生文字为吾累，此去声名不厌低。塞上纵归他日马，城东不斗少年鸡。休官彭泽贫无酒，隐几维摩病有妻。……”（《十二月二十八日，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，复用前韵二首》，《诗集》卷十九）苏轼自知此祸是由文字而起，故声名也为身累。出狱犹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对前程之充满危机自有深虑。“斗鸡”以下几句，喻自己虽遭横祸却终不学少年斗鸡邀宠阿世，而家贫又不敢休官，则思想上将服膺佛法。“维摩”句，维摩诘示疾，以“法喜”而为妻。法喜，闻佛法而生喜。可见“乌台诗案”是促使苏轼进一步接受佛家思想的重要契机因由。苏轼贬黄后，佛书成了他解脱痛苦抚平创伤的一帖良药。他给章子厚的信说：“……杜门不出。闲居未免看书，惟佛经以遣日。”（《文集》卷四十九）元丰七年，苏轼离黄移汝时所作的《黄州安国寺记》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情形：

元丰二年十二月，余自吴兴守得罪，上不忍诛，以为黄州团练副使，使思过而自新焉。其明年二月至黄。舍馆粗

定，衣食稍给，闭门却扫，收召魂魄，退伏思念，求所以自新之方，反观从来举意动作，皆不中道，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。欲新其一，恐失其二。触类而求之，有不可胜悔者。于是，喟然叹曰：“道不足以御气，性不足以胜习。不锄其本，而耘其末，今虽改之，后必复作。盍归诚佛僧，求一洗之？”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，有茂林修竹，陂池亭榭。间一二日辄往，焚香默坐，深自省察，则物我相忘，身心皆空，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。一念清净，染污自落，表里赅然，无所附丽。私窃乐之。旦往而暮还者，五年于此矣。（《文集》卷十二）

乌台之狱，黄州之贬，对苏轼的打击之骤与巨均足以给其心灵以重大的震撼，而闲居之中，有山林幽深之所可以供其回首当年省察平生追本溯源，直探人生之终极意义。他终于找到了“思过”、“自新”的最佳途径：归诚佛僧，直入本根，由现实之罪垢省察入手而归之于一念之妄，求一念清净则身心皆空物我两忘。身心世界尚且空空如也，则罪垢何所附丽；染污自落，则表里赅然轻安而自乐。此乃苏轼参禅有所悟而有所得。苏公自少即会心于庄子而常谓人生之如梦如幻如雪泥鸿爪，经大挫折之后入大省察之中，其入于佛禅也是情理中事。由此，他省悟过去读佛书并未得其真妙。《答毕仲举书》云：“佛书旧亦尝看，但 塞不能通其妙。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，若农夫之去草，旋去旋生，虽若无益，然终愈于不去也。”（《文集》卷五十六）可知苏轼此时的学佛，为的是“以自洗濯”，去除妄心杂念，使内心清净超然，了无挂碍。在《成都大悲阁记》中，他也曾描述了礼佛的妙处：

及吾燕坐寂然，心念凝默，湛然如大明镜。人鬼鸟兽，杂陈乎吾前，色声香味，交遘乎吾体。心虽不起，而物无不

接，接不有道。（《文集》卷十二）

由静坐凝默，而进入一种虚静湛明的状态，自然万物杂陈于目前，人生各种感受交遭于体内，心虽静如止水，却能与物相接而入于道，达到物我为一之境界。由此，苏轼为自己找到“洗心”、“安心”之法而极为欣慰。他高吟：“门外桃花自开落，床头酒瓮生尘土。前年开放柳枝，今年洗心归佛祖。”（《和蔡景繁海州石室》，《诗集》卷二十二）苏轼的友人范镇（蜀公）知苏轼在黄州学佛，尝来书以酒有毒、佛作祟为言，欲救其弊。苏轼复简云：“愿公宴坐静室，常作是念，观彼能惑之性，安从所生，又观公欲救之心，作何形段。此犹不立，彼复何依……”苏轼意谓默坐静室，一念清净，“能惑之性”从何而生？“欲救之心”又从何而立？苏公欲以佛理晓范公，而范公终不领受。《续明道杂志》载：

范蜀公不信佛说，大苏公尝与公论佛法其所以不信之说。范公云：“镇平生事，非目所见者，未尝信。”苏公曰：“公亦安能然哉？设公有疾，令医切脉，医曰寒，则服热药，曰热，则饵寒药。公何尝见脉而信之如此，何独至于佛而必待见耶？”

苏轼学佛的一个最大特点是，他并不执意追究“信”与“不信”的问题，而是既不盲目迷信，也不沉溺其中，他只是取佛理以用于人生思考，以求得对人生真谛的大彻大悟。苏轼贬谪惠州期间，进一步研读佛书，以期“以无所得故而得”。他说：“吾老矣，安得数年之暇，托于佛僧之宇，尽发其书，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，庶几于无所得故而得者。谪居惠州，终岁无事，宜若得行其志。”（《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》，《文集》卷十二）其“无所得”是无任何实用的功利的考虑，而其“得”则是对佛理对人生的彻悟。

由于身体的多病,苏轼亦倾心于道家的养生术。作于黄州的《与王定国书第八首》云:“近颇知养生,亦自觉薄有所得,见者皆言道貌与往日殊别。”(《文集》卷五十二)他还曾去黄州天庆观“斋居四十九日,息命归根,似有所得。”(《答秦太虚七首》之四,同上)“妄想既绝,颓然如葛天氏之民,道家所谓延年却老者,殆谓此乎?”(《与陈大夫八首》之七,《文集》卷五十六)谪贬惠州期间,由于地处罗浮山下,他时常与僧道好友同游罗浮道院与栖禅精舍,对曾炼丹于罗浮的道家人物葛洪更为倾倒:“东坡之师抱朴老,真契久已交前生。”(《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》,《诗集》卷三十八)“愧此稚川翁,千载与我俱。画我与渊明,可作三士图。”(《和陶读〈山海经〉》十三首其一,《诗集》卷三十九)他又致书刘宜翁,恳请从他学道。书云:

古之学者,不惮断臂刳眼以求道,……轼韶黻好道,本不欲婚宦,为父兄所强,一落世网,不能自遣。然未尝一念忘此心也。今远窜荒服,负罪至重,无复归望。杜门屏居,寝饭之外,更无一事,胸中廓然,实无荆棘。窃谓可以受先生之道。故托里人任德公亲致此恳。……轼虽不肖,窃自谓有受道之质三,谨令德公口陈其详。……迫切之诚,真可悯笑矣。(《与刘宜翁使君书》,《文集》卷四十九)

苏轼自谓少年起就好道,甚至不欲婚宦。入仕多年,仍未尝一念忘此心。而“胸中廓然”、“有受道之质”,则见求道之心极为恳切诚挚。在贬居海南时期,苏轼于“海外穷独,人事断绝”之境况中,仍以参禅学道为养生修心甚至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。《入寺》一诗写到:

曳杖入寺门,辑杖挹世尊。我是玉堂仙,谪来海南村。

……旦随老鸦起，饥食扶桑暾。光圆摩尼珠，照耀玻璃盆。  
来从佛印可，稍觉魔忙奔。闲看树转午，坐到钟鸣昏。敛收  
平生心，耿耿聊自温。（《诗集》卷四十一）

诗中写他一日当中，从晨起练功，到参禅打坐，由树影转午，至昏暮钟鸣，以此收敛平生心气。可以说，在黄州、惠州、儋州期间，佛老思想的确是苏轼处逆境忧患的心理支撑。

但苏轼却并不如同王维、白居易等人，在皈依佛老之后以消极的淡然的态度对待世事。王维云：“晚年惟好静，万事不关心。”白居易云：“怕寒放懒不肯动，日高睡足方频伸。瓶中有酒炉有炭，瓮中有饭庖有薪。”满足于一己之清静与闲适。轼之为轼，在于他虽学佛老，却不沉湎其中，出世之学仍以入世为根底。儒家思想仍然是他精神的重要支柱。苏轼《黄州上文潞公（文彦博）书》云：

到黄州，无所用心，辄复覃思于《易》、《论语》，端居深念，若有所得，遂因先子之学，作《易传》九卷，又自以意作《论语说》五卷。穷苦多难，寿命不可期，恐此书一旦复沦没不传，意欲写数本留人间。……公退闲暇，一为读之，就使无取，亦足见其穷不忘道，老而能学也。（《文集》卷四十八）

此书特可表见苏轼在贬逐之中极可宝贵之精神境界。巨变之后，覃思于儒家之经典以证悟生命之价值与世变之规律，托心于元典，在先哲与传统中寻找心灵的寄托。坡公黄州之时，始认真参悟佛典而更覃思儒道，正见其所作形而上之思考。穷苦多难寿命不可期，个体对生命有限性的焦虑，及儒家不朽思想形成之矛盾，以著书立说解决之，穷不忘道，也是司马迁“发愤著书”、儒家穷时节乃见的修身之道，故以儒为本旁参佛老，对主体精神淬

砺磨炼。苏辙言苏轼完成父亲未完之《易传》，遂使“千载之微言，焕然可知也。复作《论语说》，时发孔子之秘。最后居海南，作《书传》，推明上古之绝学，多先儒所未达。既成三书，抚之叹曰：‘今世要未能信，后有君子，当知我矣。’”（《墓志铭》）求知于后世君子，此正司马迁“述往事思来者”之意。苏轼不仅穷不忘道，孜孜不倦致力于儒家之学与治世之道，而且穷不忘君，穷而忧国，拳拳于国家之安危。元丰四年十二月，他闻说“种谔领兵深入，破杀西夏六万余人，获马五千匹”，遂欣然作诗《闻捷》：“闻说官军取乞 ，将军旗鼓捷如神。故知无定河边柳，得共中原雪絮春。”（《诗集》卷二十一）又作《闻洮西捷报》，有“放臣不见天颜喜，但惊草木回春容”之句。（同上）身为“放臣”而不挟怨，由衷地为官军告捷而欢欣鼓舞。赵德麟《次韵》诗说他“铁霜带面惟忧国，机当前不为身”，（苏轼《次韵陈履常雪中》诗〔施注〕引，《诗集》卷十四 是对他最好的写照 他还始终怀有一副济民的热心肠，无论贬到哪里，都为当地的老百姓办许多实事好事。贬惠之时，道人邓安道，受苏轼推荐，州官委托，致力于浮桥之建造，苏轼殷切致书，询问再三。末云：“此事不当上烦物外高人，但君以济物为心，必不罪煎迫也。”（《与邓安道四首》之三，《文集》卷六十）物外高人以济物为心，出世法为入世法，这正是苏轼后期学佛道而不忘世事，以出世法而为济世用的辩证观念。

## 第二节 对儒道佛思想的吸收

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释道三家思想各有其精华，亦各有其糟粕。苏轼在接受三家思想时，能以一种理性精神，注重取其精华舍其糟粕，以此构成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。

## 一、关于儒家思想

(一)处世态度 苏轼于儒家思想的吸收首先在于对儒家处世态度的全面接受。儒家的人生态度基本上是积极用世的。它以修身为出发点,进而实现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目标。因此儒家鼓励人“志于道”,建功立业,有用于天下。孔子的“吾与点也”的著名对话,赞同曾点追求独立人格和人生纯任自然的境界,却不是对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以经世治国平天下为目标的否定。(见《论语·先进》)然而一部《论语》也清楚地记录了孔子因“道不行”不得已而产生的高蹈远引的思想。如“天下有道则见,无道则隐”(《泰伯》);“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”(《公冶长》);“邦有道,则仕,邦无道,则可卷而怀之”(《卫灵公》);“用之则行,舍之则藏”(《述而》)等等。孔子的处穷态度是安贫而乐道。他非常称赏颜回在陋巷而“不改其乐”,他说自己“饭蔬食饮水,曲肱而枕之,乐亦在其中矣!”孟子将上述思想归纳为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。历来士大夫都是先有志于用世行兼济之志,后遭受挫折欲有为而不得则恬退归隐独善其身。而苏轼对于儒家处世态度的接受,贵在无论穷达皆能存独善之心而又行兼济之志。

苏轼从入学读书起,即闻当朝人杰与前代名宦,由崇敬之情进而奉为人生楷模,激励他奋力进取而有澄清天下之志。苏轼《上梅直讲书》云:“轼七八岁时,始知读书,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,其为人如古孟轲、韩愈之徒。……其后益壮,始能读其文词,想见其为人。”(《文集》卷四十八)又《范文正公集叙》一文中记,轼总角入乡校时,即由乡先生口中得知“韩(琦)、范(仲淹)、富(弼)、欧阳(修),此四人者,人杰也。”“时虽未尽,则已私识之矣。”(《文集》卷十)苏辙《墓志铭》追述苏轼十岁时,母亲程氏亲授以书。“太夫人尝读《东汉史》,至《范滂传》,慨然太息。公侍